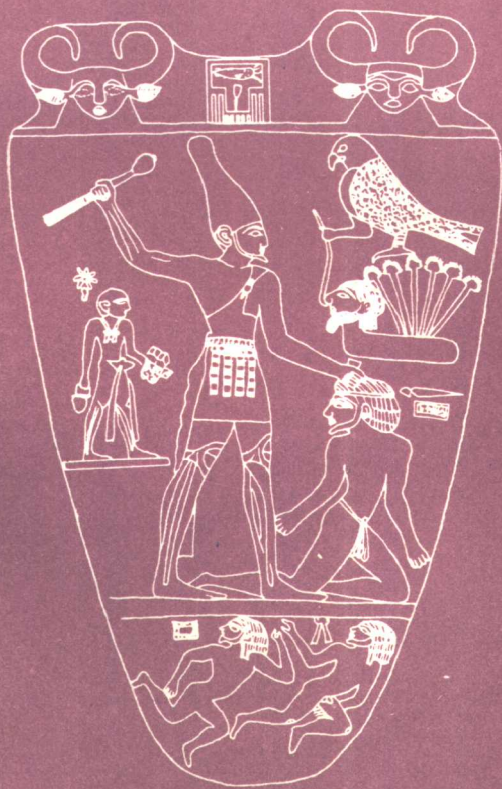


世界古代史

论文选

孔令平 冯国正 编



世界古代史

论文选

葛今平 陈国恩 编



世界古代史

論 文 選



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	周谷城	1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吴于廑	6
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政治	日知	16
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	胡钟达	31
达尔文和人类起源的研究	吴汝康、林圣龙	44
试论原始社会史的分期问题	林耀华	52
论人类的童年——群，兼论原始社会史的分期	陈国强	60
蒙昧时代低级阶段是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	毛昭晰	67
对杂交、血缘婚和马来亚亲属制的质疑	谭乐山	74
人类从前存在过血缘家庭吗？	蔡俊生	82
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	孔令平	84
关于城邦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敦书、于可	97
关于奴隶社会史的几个问题	左文华	107
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	陈隆波	113
从古罗马城邦看古代城邦的结构与特征	王闾森	124
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论古代东方社会的几点体会	马克尧	133
关于东方专制主义	廖学盛	144
驳卡尔·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	吴大琨	149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典范	孙道天	159
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诸国的奴隶制形态	黄松英	166
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北印度社会性质和发展趋向蠡测	刘家禾	179
古代印度社会几个问题	崔逢仲	190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与奴隶	张毅	198
古代埃及的早期国家及其统一	刘文鹏	209
关于埃及国家的诞生问题	张忠民	218

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

周谷城

这里所谓古代，指的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到公元七世纪中叶一千余年的时期。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正是古波斯帝国开创成长的时候；公元七世纪中叶，正是萨珊王朝波斯帝国灭亡的时候。所谓西亚，指的是中国西部边境以西，直到地中海东部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西北包括小亚细亚半岛，西南包括阿拉伯半岛。东北有靠近中国的阿姆河流域的很多地方，东南有靠近印度河流域以西的很多地方。北边靠近里海，南边即是印度洋。这一大片土地，在历史上是世界有名的“丝绸之路”经过之地，现在是我们的友好邻邦所在之地。它在历史上的国际地位，是很重要的：它是东方与西方贸易往来或交流之地，它也是东方与西方文化发展、接触或交流之地。它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东方如中国与印度等贸易、文化向西方发展，如要达到西方，必须经过西亚。西方如希腊与罗马等贸易、文化向东发展，如要达到东方，也必须经过西亚。西亚在历史上，尤其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到公元七世纪中叶，确实发挥了这样的桥梁作用。

古波斯帝国时东方文化的西进

(一) 古波斯帝国是雅利安人(Aryans)中波斯人创建的。雅利安人这个名称是从雅利安语系而来的：属于雅利安语系的人有印度人、希腊人、罗马人、日尔曼人、克尔特人以及斯拉夫人等等。波斯人，在语言方面，也属雅利安语系。不过这种人种虽同属雅利安语系，他们的骨骼、血缘、发式、眼睛、头盖等并不完全相同。波斯人最早发迹之地，大约在里海的西北方面。他们南下到波斯湾上，与原有的米地亚人相处，并受其统治。公元前六世纪中叶，波斯人中有一杰出的人物，叫居鲁士，因不堪米地亚人的暴虐统治，乃号召广大人民，推翻米地亚人的统治，把米地亚并入波斯，创立了波斯帝国。居鲁士革命成功，于公元前五四六年，登上波斯王位；接着便是彻底克服米地亚的统治势力；其次便是征服吕底亚，统治小亚细亚全境；再其次是征服加底色或后巴比伦；最后便是征服埃及。埃及被征服后，古波斯帝国即已告成。其国土之大，东到印度河以东，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北达里海及阿姆河流域，南临印度洋；于今中央亚细亚南部，阿拉伯半岛北部，欧洲色雷斯，非洲的尼罗河下游，都在帝国统治之内。

(二) 古波斯帝国开创之时，就是武力向各方面扩大之时。帝国成立以后，对西方更有几次推进，深入到了欧洲多瑙河流域及希腊半岛。居鲁士的统治告终以后，继起的大流士即于公元前五一二年率大军远征欧洲：首先进抵黑海沿岸，然后过波斯普鲁斯海峡，沿黑海西

岸前进，达多瑙河下游，并用浮桥渡多瑙河，深入斯克泰人的心腹之境。这时斯克泰人已闻风逃走，大流士的军队即为古波斯帝国在欧洲开辟了马其顿及色雷斯两地。然当大流士远征斯克泰人之时，有一希腊人名叫希斯夏，因保护多瑙河桥，便利远征军有功，大流士为报答他的功劳，以所占色雷斯地方的一个城市交他镇守。这个人后以背叛嫌疑，被召回波斯首都加以软禁。谁知软禁竟成了导火线，引起希腊人的暴动，构成波斯希腊间的长期战争。自公元前四九〇年马拉松之大战起，到公元前四七九年色多斯的被陷止，凡十余年，是波斯与希腊间大战的时候。波斯远征希腊的基本原因，为商业殖民与帝国统治的对立。希腊在当时商业很盛：凡黑海沿岸，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尽是希腊的商业殖民地或自由城市。波斯帝国武力发展到这些地方时，尽把这些地方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构成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是波斯与希腊战争的基本原因。战争开始，波斯武力，或由小亚细亚靠近萨摩斯岛的地方出发，直渡爱琴海，达到希腊西南的雅典；公元前四九〇年大流士的舰队就是循这条海道，直达希腊本土的。或由小亚细亚的撒迪斯出发，渡达达尼尔海峡，入色雷斯，经马其顿到希腊北部，然后南下入雅典。公元前四八一年到公元前四八〇年，大流士之子的陆军便是循这条路而达希腊本土的。此外还有一条很长的路线，不是直渡爱琴海，而是沿着爱琴海边航行，直达希腊本土的。

（三）波斯与希腊的战争，对于双方文化的交流，固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对东方文化的向西方传播，促进作用更大。原来波斯的统治势力与希腊的商业势力，在小亚细亚方面关系很密切，东西文化的交流传播非常方便。而波希大战之中，波斯竟成了东方文化向希腊传播的主力：它不仅把自己的创作向西方输送，而且把从巴比伦、埃及和爱琴海中克里特岛等地吸收来的远古文化（这些文化都属东方系统）也向西方输送。考古学家柴尔德云：“小亚细亚，实由亚洲突出，而与欧洲接近的一个地区。自波斯首都苏萨到小亚细亚西端的撒迪斯的一千五百余英里的驿道，正经过这一地区的中心。”波斯军队曾沿着这条驿道把东方文化向希腊输送。而外交家、科学家以及商人等更沿这条驿道把巴比伦的思想输入希腊各城邦中。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波希战争，曾把“苜蓿”（Alfalfa）输入了希腊。苜蓿是喂马的一种很好的饲料，希腊人称之为 Medike，因为大量生产于波斯境内的米地亚，而由波希战争时传入希腊的。中国音译为苜蓿，可能出自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 baso。希腊人又称桃子为波斯苹果，杏梅为亚美尼亚苹果。他们以为桃子出自波斯，杏梅出自亚美尼亚。劳费尔在《中国伊兰》一书里说，希腊人错了：桃子原来出自中国，杏梅原来也出自中国。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不过做个媒介，把桃子和杏梅从中国经由波斯输入地中海地区而已。这就更清楚了，波斯人是把东方文化向西方推进的人。平常所谓文化，英文叫 Culture，原意为栽培。波斯人把苜蓿、桃子、杏梅等及其栽培方法一并传到西方，真正是东方文化西进的推动者。

亚历山大帝国时希腊文化的东移

（四）西亚的古波斯帝国，自大流士大帝死后，似已开始衰落。正在这时，南欧方面，希腊半岛之北，有马其顿人渐渐兴起，最后创立帝国，向东方进逼。马其顿与希腊相接，但

马其顿人的文化与希腊人的文化却是远远不一致的。当希腊人已进入文明的高级阶段时，马其顿人似乎还停滞在半开化阶段之末。两方的种族虽同出一源，同属印欧民族或雅利安族，两方的语言虽同出一系，同属印欧语系或雅利安语系，但因文化程度远不一致，彼此是敌对的，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到了公元前三六〇年时，马其顿人中有一杰出者，名叫腓力普（Philip），是一个受过希腊教育的人，且深知当时希腊内部政治的不团结。他于是首先向抵抗最少的北方和东方扩充土地，把他的国土扩大到多瑙河及希勒斯泮（Hellespont），然后率领大军南下，向希腊进攻。当时希腊有两派：一派是由伊索克拉迪（Isocrates）领导的，他们认为腓力普是友好的，是希腊的救星，愿意同他友好相处。另一派是由德草东尼（Demosthenes）领导的，他们认为腓力普是一个半开化的霸者，是奴役希腊人的，他们激烈地反对他。结果前者获胜，到公元前三三八年时，腓力普竟成了全希腊的首脑，统一了希腊全境。

（五）此后两年，腓力普被内奸刺死，他的儿子名叫亚历山大便继承了父业。他一方面肃清一些反叛残余，另一方面计划远征亚非各地，建立空前庞大的帝国。他于公元前三三四年春季，由马其顿出发，先进攻小亚细亚，在撒迪斯一战打败波斯后，便向东南发展，然后沿地中海东部海岸南下，更向西进入埃及。在埃及尼罗河下游没有停好久，又向东北折回，越过两河流域，深入波斯腹地，并经过它的首都苏萨。从苏萨再向东北前进，进到阿姆河上游地方，然后从这里向东南发展，越过印度河。在印度河以东停了些时候，然后沿印度河直下，再分海陆两路向西方回去。他自己走的陆路，于公元前三二三年，回到巴比伦，因热病死了。总计约十二年，亚历山大从南欧到西亚，由西亚到北非，再由北非回西亚，东入印度，绕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圈子，建立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庞大奴隶主帝国。帝国版图之大，南欧包括希腊全境及其北边的马其顿和东北的色雷斯，非洲包括尼罗河下游埃及的土地，亚洲包括整个西亚，东边靠近了中国，东南到了印度河以东。

（六）这个庞大的疏松的奴隶主帝国的开创过程，就是传播希腊文化的过程。马其顿人、希腊人以及被他们威逼一道远征的人，每到一个重要地方，他们如果认为必要，就在那里建立希腊化城市。例如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就是一个以亚历山大大帝为名的，留传至今的希腊化城市。初建之时，居民分区居住，有犹太人区，有埃及人区，有希腊贵族奴隶主住宅区。围绕城市的是村庄。在希腊化的城市里及其周围，征服者或战胜者便把希腊文化向被征服者或战败者直接或间接传播。这样的城市，到处都有，如小亚细亚，如巴比伦或两河流域，如波斯中心地带，如阿姆河流域，乃至印度，都有类此的城市。

亚历山大死后，继起统治西亚的为塞琉古，也是一个马其顿人。他继承了亚历山大的遗志，也要大力传播希腊文化，也建立了很多希腊化城市，并以他自己的名字为名，称塞琉古市。这样的城市之多，以数十计。城市居民主要为马其顿人、希腊人及希腊奴隶主贵族。当地居民，亦即被征服的波斯人被迫接受了希腊文化：凡希腊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艺美术，乃至整个思想意识，都以希腊人为榜样。当时正是所谓希腊化盛行之时，因之希腊文化便在西亚各地流传发展。

· 尤其是艺术思想和风格影响最大，深入了印度，影响了佛教艺术，从而促成了有名的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印度的佛教，原来是没有偶像的。自从希腊艺术影响传入，佛教仪式里便也有了偶像。而佛象的塑造，最为突出，最富有希腊色彩。希腊化的佛教艺术是希腊艺术与

佛教艺术的混合体，称为犍陀罗艺术。因为它盛行于阿富汗与印度间，以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罗地方。犍陀罗艺术后更随佛教传入中国；中国艺术中有希腊的色彩，当是从犍陀罗艺术来的，也就是从印度境内希腊化的佛教艺术来的。追溯远源，还要提到亚历山大的东进，还要提到亚历山大帝国时希腊文化的东移。

大夏、安息时文化与贸易的活动

(七) 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在中国西部边境之西，居于阿姆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为古波斯帝国的一个省区。亚历山大东进时，曾屈服于其统治之下。亚历山大死后，又为继起的塞琉古所统治。其地物质条件颇好，土地肥沃，宜于生产。其人即巴克特里亚人，是波斯人的一支。公元前二五六年，他们势力壮大时，曾脱离塞琉古的统治而独立。他们在贸易方面，远与希腊有间接的关系，近与中国和印度有直接关系。亚历山大东进到大夏，即以此为东西贸易交接的一个重要中心。中国运销罗马的丝织物，要经过这里。它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我们的《汉书》《西域传》里及《张骞传》里都有很好的记载。记载说，汉武帝时张骞曾到大夏，亲见大夏商人从印度购入的中国产物邛竹杖和蜀布。这足见印度与大夏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张骞出使大夏时，同行的凡三百多人，所带的马、牛、羊数以万计；金币帛的价值也以千万计。去的目的，除政治方面进行联络外，经济方面更有一大目的，即是购买西方的好马。据记载说，所得好马确实不少：来自乌孙的好马，称之为西极马；来自大宛的所谓汗血马，称之为天马。此后往来贸易还延续了很久，每年有大批人往来。这足证大夏与中国间贸易之盛。

至于大夏与印度的文化关系，更大有可观。亚历山大东进时，就以大夏为一重要据点。在这里设有许多亚历山大市，进行希腊化，因此希腊文化便在这里向各方面传播。亚历山大活着时，情况固然如此；他死了以后，在继起的塞琉古统治时，情况还是如此。最特别的一点，即大夏国王米兰德于公元前一六〇年对印度大力推行希腊化。从此以后，旁遮普、兴都库什山麓以及阿富汗边境，出现许多希腊化的小国和城市。其中心在印度境内的山格拉。以山格拉为中心的印度希腊化，曾盛极一时。直到公元前一三九年左右，大夏因月氏与安息的夹击，终于灭亡；自亚历山大东进以来，希腊文化东移的影响，才逐渐衰落。

(八) 安息就在大夏之西，里海东南，也是古波斯的一个省区，也曾受亚历山大及其继起人塞琉古的相继统治。它在塞琉古帝国统治之下，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自公元前二五〇年脱离塞琉古帝国，并取其地位而代之，成立一大帝国。它的人民为帕地亚人，依其创国之主阿萨西斯之名，称安息帝国。安息帝国全盛之时，版图之大，东达印度河，西达幼发拉底河，南濒印度洋，北达里海沿岸。整个西亚，几乎全在它的统治之下：东与中国相接，西与罗马帝国相接。在历史上，它是继承古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等等的传统而兴起的，所以受希腊化的时间已很久。在地区上，它的国土内有封君领地，有希腊化的城邦，以及希腊化的自由城市，所以希腊化的地方面积也很宽。安息人的整个文化生活，几乎都希腊化了。他们的文学，大半带希腊意味，希腊戏剧，他们特别喜欢。希腊文字在全国也很通行。最近，在过去安息境内，米地亚的西边，发现两件希腊文书。就年代看，一件是公元前

八八年的，一件是公元前二二到二一年之间的。其中所讲的事情为买卖葡萄园订立的契约。就这个例子看，当时的希腊文字，在安息大概也是很流行的，甚至是全国通行的文字。在雕刻艺术的旁边，常常附有希腊文的铭刻。例如比希斯通岩上的雕刻旁边，就有许多这样的铭刻。

(九) 安息在当时，正是世界三大帝国之一。当时东起太平洋，西抵大西洋，有三个并立的帝国，即中国、安息和罗马。中国当时正值汉代；帝国之大，东起太平洋，西达帕米尔。罗马亦当帝国全盛时代，地跨欧、亚、非三洲，西起大西洋，东抵幼发拉底河流域。安息帝国正介于东西两大帝国之间；它与罗马的关系，比较偏重于军事方面；与中国，则以贸易关系为最突出。《汉书·西域传》说：汉武帝最初派遣大使到安息，安息国王曾组织两万骑兵到边界上迎接。由边界到首都，路程很远，经过几十座城市，到处都是人民。回来时，国王又派遣使者一道来汉帝国考察，并赠送很多鸵鸟蛋及犁轩地方的魔术师给汉武帝，汉武帝很高兴。至于《后汉书·西域传》更提到后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八十七年）安息曾遣使献狮子、符拔（一种可以玩赏的动物）等物。和帝永元九年（公元九十七年）汉帝国曾由都护班超遣甘英经安息访罗马，被大海所阻，未能达到。永元十三年（公元一〇一年）安息国王复遣使献狮子及大鸟或所谓安息鸟给汉帝国。从史书记载可见安息与汉帝国的贸易关系一开始就是很好的。

萨珊波斯的国际地位

(十) 当安息帝国开始衰落之时，萨珊波斯便开始兴起。安息帝国的民族主要为帕提亚人，但并不纯净，其中杂居了很多外来的黄种人，如斯克泰人等。它的统治自始就因此而不甚稳固。在这种统治之下，古波斯人的后裔中有阿尔戴西尔这么一个人，他可能是安息帝国内的一个封君，因不堪斯克泰人等的歧视，便团结波斯后裔，推翻安息统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以他的祖先萨珊为名，称萨珊王朝。萨珊波斯在当时，亦即公元二二六到六四一年的时代，实处于文明世界之正中，东有中国，西有罗马，其强大几乎胜过这两者。它控制着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蚕丝和丝织物品要运销罗马，必须经过西亚的萨珊波斯。萨珊波斯人对中国与罗马间的蚕丝及丝织品的买卖，控制很严，正如安息人控制这种买卖一样。中国丝织品最初运销印度，然后由印度运销罗马。不过中印间的交通困难，后来有人走里海附近，经过突厥斯坦这条路直入中国，把中国丝织品直运罗马。但这仍须受波斯的控制。对罗马人来说，最好莫如自己养蚕出丝。罗马早在凯撒时代就需要蚕丝，以作织品的原料。但养蚕的方法却在中国人手里，罗马人一直不知道。直到六世纪中叶，中国养蚕方法才经由波斯人之手，传入欧洲。当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发觉丝的西运，常被萨珊波斯所阻，乃秘密雇请久居中国的波斯人，为他服务，把中国蚕种秘密运到罗马。其手法便是把蚕种藏在用作手杖的竹管里，带至东罗马首都。从此，萨珊波斯控制蚕丝西运的局面被打破。

(十一) 萨珊波斯在贸易方面的国际地位固然很重要，在文化方面的国际地位也是很重要的。例如上面所提到的丝织物品，就可作为一个例证。在我国吐鲁番地方曾发现很多丝织物品，上面具有花纹。花纹有的是印的，有的是织的。花纹的图案或母题，有些完全是中国

（下接第 51 页）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吴于廑

编者按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在昆明举行。会议期间，学会理事长、武汉大学副校长吴于廑教授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邀请，向云南省史学界作了题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学术报告。本文系根据报告整理而成。

一、引言

历史这门学科之所以引人入胜，原因之一在于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即人类的过去，常常要求人们对它进行再认识。对历史进行再认识之所以必要，其一是基于哲学的原因，如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历史由于天定，十八世纪启蒙史学家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改变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是历史演变的基础。其二，有决定意义的新史料的发现，例如十九世纪西亚楔形文字泥版文书的发现，二十世纪初克里特线形文字的发现，我国甲骨文、敦煌文书的发现以及重要古代文明遗址的系统发掘等等。其三，某种历史事件在发展上蕴蓄着潜在的力量，在一个时期内只能发挥到一定的限度，因而一个时期内的历史观察者不能充分认识其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续，潜在的力量发挥得愈来愈明显、充分，这就要求后一时期的历史研究者对前人已经考察研究过的同一历史事件的发展进行再认识。例如十八世纪中叶，1769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工业动力供应上的一次革命。但在当时，也不过作为一项新奇事物看待而已，可以说，没有一个历史观察者认识到这一事件及其发展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过了六七十年，即1837年，法国人布朗基首次提出“工业革命”这个词，并且以之与法国革命并称，这才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深入的再认识。又过了半个世纪，英国人安诺德·陶因比对工业革命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之后，作了多次学术演讲，后来由他的门生汇为一书，题为《英国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论集》。这才对由瓦特的发明而肇端的工业革命，进行了又一次更为深入系统的再认识。如果不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要从一开头就能充分认识由瓦特的发明而引起的工业生产上的巨大变革，任何有预见之才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做到。

还有一种原因我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表达，姑且称之为观察历史广度的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说这句话以前，在和恩格斯合著的《费尔巴哈》一书中，曾经提

出这样一个看法，这里不逐字引用原文了，其主旨是，“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因生产的发展“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就是说，历史之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由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相互闭塞的历史，发展到有联系以至于密切联系为一体的世界史，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的，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在历史尚未发展成为世界史之前，存在着的长期彼此闭塞的状态，必然影响人们对历史观察的广度，限于这一国、那一国，这一地区、那一地区。这个影响至今存在。我们研究世界历史或著述世界历史，观察问题的广度，习惯上还是分区分国，甚至可以把本国置于世界史之外。虽然自十五、十六世纪以来，特别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已经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了，但我们考察世界历史上的问题，视野总难以跳出分区分国的那种考察的局限。要使世界史这门学科真正是以世界全局为历史考察对象，那么研究者就必须适应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这一过程的演进，在考察世界历史问题上，必须突破旧的局限，具有宽阔的广度，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对世界历史的新的再认识。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国外所出关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图书，其视野之广，已显然和过去不同。这种趋向值得注意。

我想本着这样的想法，即从放大观察广度上着眼，谈谈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关于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两者的内部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问题，都不列在这次讨论的范围之内。尽管如此，涉及的问题还是很广泛。疏漏谬误的地方，必不能免，请与会同志们指正。

二、亚欧大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形成与并立

距今约一万年前，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开始发生了农耕。大约与此同时，也发生了畜牧。从这个时期起，人类开始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包括以种植谷类为主的农业生产者和以繁殖畜类为主的牧业生产者，这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发展的一次飞跃。

由此开始，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各具特色的农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亚，在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地带，驯化了野生麦类，发展为种植小麦、大麦的农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中国的黄河流域可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农耕中心，因为这里培育了稷，即小米。《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苽麦”的“禾”就是小米，这点清代学者已经指出。中国长江以南以至东南亚、印度恒河一带，则是以培育水稻为特色。1973年冬至1974年春，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发现籼稻谷种，说明早在六千七百年前，中国长江以南已经栽植水稻。还有一个中心是墨西哥，约在七千年前培育了玉米。这个农耕中心是约二万几千年前由亚欧大陆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梁进入美洲的印第安人开拓的。由于冰川的北退，陆梁消失，这个中心和亚欧大陆完全断绝联系。秘鲁可能是另一个单独发展种植玉米的中心，和亚欧隔绝的情况与墨西哥相同。还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可能也有独自发展起来的农耕中心，也是长期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我今天讲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地理范围大体限于亚欧大陆，有时要讲到北非；在年代上不会涉及公元十四、五世纪以后。因之海道大通之后的世界形势，不属这次讨论的范围。下面谈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墨西哥、秘鲁以及非洲内陆都不包括在内。

农耕中心形成之后，就缓慢地向其他宜于农耕的地方扩展。

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大、小麦的培植，逐步向东、西两翼扩展。向东，一条线到达伊朗中部和北部，可能更延伸到阿富汗境；另一线偏南到达俾路支，远及印度河流域。向西，最早进入爱琴海诸岛和希腊，然后大体沿形成扇状的分线深入中欧、南欧和东欧；偏北一线由巴尔干进入多瑙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诸地，以后向东分入乌克兰平原，向西越海分入不列颠岛；偏南的一线沿地中海进入南欧诸地，包括今意大利、法国南部和伊比里安半岛。埃及和北非之种植小麦，大概是经由巴勒斯坦传过去的。把这些麦类种植传播所及的地区和前面讲到的中国和东南亚培植小米、水稻等地区合在一起加以考察，经过好几千年之后，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尼亚至伊朗、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还有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发展的水平当然很不一致。这个地带绵亘于亚欧大陆两端之间，形成一个偏南的长弧形。我们不妨称此长弧形地带为亚欧大陆上的农耕世界。

农耕世界的经济是以农为本的经济。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狭隘的地方性，彼此闭塞；尽管这种闭塞并非绝对的，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在程度上也并非是一致的。农本经济可以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包括手工业、商业，以及市集、城镇等等的发展；各个以农为本的地区之间，也可以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往，并且彼此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只要还是以农为本，总不能彻底改变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社会形态里，凡属农耕地带的各个地区，其基本情况都是这样，都是以农为本，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对闭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这样提到：“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的民族那里，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地位……”，这些话，尽管不是针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讲的，但为理解这里所讲的前资本主义不同社会阶段以农为本的问题，重温这些话极有意义。

当农耕最初出现于历史的时候，它往往是与畜牧相结合的。许多由考古发现的最初农村遗址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人类，逐步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从植物的驯化到农耕，另一条是从动物的驯化到游牧。雨量充足、河渠充盈、土壤肥沃的地带，逐渐发展以农耕为主，农耕不断扩展，就形成上面所说的一个横亘亚欧大陆偏南的农耕地带。雨水很少，但是草原辽阔、冬季白雪复盖的山峦，到了夏季，山坡上却牧草丛生，象这样的地带，就逐渐发展以游牧为主，形成了游牧地带。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即上面所说的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部地带。对这个地带，我们不妨也援前面提出的农耕世界之例，称之为游牧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

亚欧大陆两大平行地带形成之后，它们的历史发展的前景不一样而又相关联。农耕生产的增长率，大于游牧生产的增长率。农耕之必然趋向于定居，又使它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

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有较大的和较为稳定的连续承袭的可能。食物生产丰饶以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或更多的社会劳动力从事于农耕以外的活动。例如手工制造、金属开采和冶炼、建筑、开凿河渠、贸迁有无、社会管理、宗教祭祀等等。总之，较快地诞生了文明，较早地出现了阶级分化和公共权力，也在较大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秩序。由于管理、防卫和交换的需要，还逐渐兴起了城市或社会分工较细的居民密集点。这就使农耕地带富庶并且文明了起来。东西方古典文明，中世纪东西方各国的封建文化，都诞生、发展于这个偏南的长弧形农耕世界。与此相比，游牧地带的生产当然也在发展增长，但增长得缓慢，不能或很少能分出较多的社会劳动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种活动。也有社会阶级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种淳朴的然而却是落后的状态。这两个平行存在的世界一个富庶先进，一个贫瘠落后；南农北牧，南富北穷。两者之间的南北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农耕世界偏南，在偏南的地方，也有从事游牧的部族，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游牧世界偏北，在偏北的地方，也有从事农耕或半农耕的部族。《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朝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见闻，中亚一带，既有“行国”，也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的农耕民族。

农耕世界形成国家以后，在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接壤地区，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古代国家的疆界，去中心越远越模糊，不能用近代的有精密地图为据的国界线的概念去看古代国家的疆界。总有一个两方都可出入的、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的所谓边界。边界对于古代国家，是一个沿其领域而延伸的狭长的面的概念，而非线的概念。就在这个面里，发生和发展着两个世界间的各种交往和矛盾。交往常常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不过，交往不总是和平的、田园诗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同样存在着以暴力书写的历史。

三、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

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我认为，可以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

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是在主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族与农耕世界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制造就是这样。农耕世界具有的金属武器，游牧部族也能具有。活动于亚欧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斯基泰人就善于铸剑。源出游牧部落、后来进入西亚边缘的赫梯人，最早冶炼并锻造了铁器。游牧世界使用金属武器，起初是青铜武器，后来是铁武器，并不落后于农耕世界。既然双方使用武器的水平大体相当，一旦出现其他因素，如农耕世界的国家因内部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出现力量衰落的情况，毋宁说，游牧部族在这种时机向农耕世界进行冲击，完全有可能占据优势。

游牧世界具有一个农耕世界无法与之比拟的特点，这就是它的流动性，它有相对于农耕世界的较高的机动能力。在军事上，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特点，机动性强的少数就能制胜安土重迁的农耕世界的多数。自从战车和马进入历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来就

已具有的机动性，更其成倍地增强。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量，往往使农耕世界的文明先进的国家，特别当它们因内部矛盾而陷于衰落的时期，处于难以防御的地位。

我们现在知道的最早的战车，是公元前二十七至二十六世纪苏美尔人的战车。这种战车见于从乌尔王陵中发现的“乌尔军旗”上镶嵌的图象，四个实心车轮，由已被驯化了的野驴拖拉，非常笨重。苏美尔人不知有马。不仅他们不知有马，就是过了八九百年，到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十八世纪，农耕世界比较先进的两河流域也不知有马。汉谟拉比法典的条文中，多次提到牛、羊、驴、大小牲口，但没有一处提到马。连马都没有，更不用说用马拉的战车了。驾马的战车出于何时何地，不清楚。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出自高加索一带的山地游牧部族。不论怎样，约当公元前二千年前后由外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就已经知道用马驾车。赫梯法典从五十八条起一再提到马，驾车的马，还提到马勒和驾具。公元前二千年代中期，一些冲入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来自北方的游牧、半游牧部族，都已使用了马驾的战车。这种车双轮，车轮有辐，一般是六辐，不是实心的。每车载两人，一个御者，一个战士，用弓箭，比苏美尔时代的驴拉的四轮车，轻便快速，具有远为超越的机动性能。公元前十七世纪从西亚经巴勒斯坦长驱直下埃及并加以征服的喜克索斯人，用的就是这种战车。公元前十六世纪初大掠巴比伦的赫梯人，稍后入侵巴比伦并且建立长期统治的迦喜特人，先后经高加索山南来的游牧部落西密里安人、斯基泰人，进入两河北部国立的米丹尼人、胡里特人以及和他们敌对并又彼此敌对的乌拉尔图人、亚述人等，大都已知驯马，以驾马的战车加强他们的战斗力量。古代世界两个农耕文明发达最早的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抵挡不住以战车武装起来的来自北方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的冲击。

同时期内，即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在美索不达米亚东西两面，都有来自北方的印欧人部落向南的冲击。东面，雅利安人冲入印度，有马有战车。而早于他们的印度河流域上的哈拉巴诸城邦，这时也是不知有马，他们的车是牛挽的车，显然不是战车。只有牛挽的车的哈拉巴人，抵御不了拥有马驾的车的雅利安人。在西面，另一支印欧种人，即最早一批的希腊人，冲入希腊半岛，文特里斯释读成功的迈锡尼线形文字乙，证明他们有马、有战车，后来他们进入爱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这批最早南下的希腊人，在荷马史诗中也有反映。荷马史诗所追忆和歌颂的属于这个时代后期的英雄人物，就是驾着战车去打仗的。

公元前二千年代中叶，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也经历着商朝取代夏朝的变化。消灭夏朝的商从哪里来？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金景芳先生有一篇论证商人来自北方的文章，我觉得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关于战车，夏朝有没有，不能光靠后代的文献记载，现在只能存疑。至于商代，考古发现已经使人信而有征。商都附近的大司空村、孝民屯大墓的发掘，从随葬的车马坑证明有车有马，而且车是双轮，用双马，还有御者。这和甲骨文中“车”字的一些字形如“𨋖”对照，真是不爽毫厘。很有可能，如果商人确如金景芳先生所说，来自北方，则他们利用的双轮车也会是从北方来的。至于商克夏的鸣条之战，是否以战车取胜，还无从回答。如果讲到约五个世纪后周武王伐商末王纣的一战，则回答是可以肯定的。《史记·周本纪》记牧野之战说：“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四千之数，可能有夸大。《孟子·尽心》中说：“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这大概没有把诸侯来会的车包括在内，可能接近真实。不论怎样，看来这是一次规模颇为可观的车战。

由上所说，在古代亚欧大陆整个农耕世界，约从公元前二千年代的中叶开始，都经历了由北方来的以战车为武装的各个部族的入侵。这是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第一次冲击浪潮。当然，在中国灭掉夏朝的商，不能说是还处于游牧状态的部族。卜辞反映了它们已经经营农耕生活。可以引起注意的，是他们也有马驾的双轮车，并且还有人提出了他们来自北方的看法。

这里不打算谈由战车发展为骑兵的问题了。只指出一点，即在亚欧大陆的东边、西边，都是先有马驾的战车，然后才有乘在马上 的骑兵。骑兵比战车的优越性，只举一点就明白了。战车在西亚是一个御者，一个战士，每车二人，驾御和作战分工。中国是每车御者一人，战士左右各一人，共三人，也是驾御和战斗分工。骑兵一人一马，下肢驾御，上肢战斗，人力配备少，而机动性能大为加强。和战车相比，还不大受地形的限制。早在游牧世界各部族发动第二次冲击浪潮之前，他们已掌握了骑射结合的骑兵战术，铁兵器也早已代替了青铜兵器。

当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冲击浪潮将临未临之际，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兴起不久的两大帝国，即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对具有骑兵优势的北方游牧或半游牧部族，都基本上采取戒备御政策。公元前二〇〇年，汉帝国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到今大同东南的平城，匈奴冒顿单于“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如不是向单于的阏氏纳了重贿，几乎脱不了身。北方游牧部族第一次显示出来的骑兵威力，不得不使汉朝统治者对北方边界的防备高度重视起来。汉武帝之所以把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以西玉门关，置河西四郡，沿边设置烽燧，随时报警，目的就是防止游牧民族南下。西边罗马帝国采取类似的防备策略。它把多瑙河、莱茵河当作自然边界，两条河上游的空缺之处，它筑起城寨来堵住这个缺口。在进入不列颠岛之后，又在苏格兰、英格兰之间筑了一道城，号为哈德良城，几乎是和汉朝把长城向西延伸同时。他们这样做，以为可以把游牧、半游牧以及正转向农耕的部族阻止于农耕世界的边线之外。汉文帝曾经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南，冠带之室，朕亦制之。”汉文帝是一位躬行黄老之术的言行谨慎的皇帝，这些话说得宛转而和解。他很想把长城作为南农北牧的一道屏障，彼此相望而不相犯。但是，从古以来亚欧大陆两个并列地带的矛盾运动远未结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从南方富庶的农耕地带取得他们所需要的财富、物产，特别是他们部族中的上层。汉文帝时，一个投匈奴去的中行说，后来成了匈奴统治上层的代言人。《史记·匈奴列传》曾经记下他说过的一段话，用现代汉语说，就是：你以农耕为本的汉族，要拿足量的上好的丝布粮米给我游牧的匈奴，否则，等秋天你们田里的谷子熟了，我们的骑兵就来抢收。还有倾向于农耕的要求内居，获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南方农耕世界国家的统治者，当条件具备的时候，也要开疆拓土，移民实边。罗马的恺撒就曾推进到莱茵河外。汉朝的武帝也曾进入朔方，并且“往往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司马迁用“稍蚕食”三个字，是站在农耕世界国家的立场落笔的，实质上是侵夺了游牧世界的土地。还有，为了强化自己的兵备，也要向游牧部族取得马匹。和平的办法是市马，或者象汉武帝对乌孙那样，允许乌孙以千匹马聘汉皇室女江都翁主；这其实也是“市”，是以婚聘礼仪掩盖起来的“市”。这是和平的办法，但有时也要用暴力手段去夺马。也是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逼迫大宛拿出马三千多匹。总之，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远远没有结束。以后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东汉窦宪把北匈奴逐到中亚以

后，在亚欧大陆的东端，即中国，北匈奴赶走了，南匈奴内迁，接着原来在匈奴之东的乌桓、鲜卑以及拓跋诸部，跟踪而来，在他们后面还有东西突厥。后来他们推翻了西晋，在长江以北先后成立了十几个政权，完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地图。这个局面直到唐朝才算结束。在亚欧大陆的中部，被匈奴赶过去的大月氏，其五部之中有一部是非印欧语系的贵霜，可能源出塞人或突厥人，进入大夏、印度，建立贵霜国。在公元一世纪迄二、三世纪，其统治范围南达印度的北方邦，接近恒河流域。还有一支匈奴人和大月氏人的混合种哒哒人，称白匈奴，约在公元五世纪初由中亚南下，到五世纪后期，占有伊朗东部和印度西部的大部分，迫使一度强盛的笈多王朝勉强保持残局。直到六世纪中叶，才退出克什米尔，结束了对印度的冲击。

亚欧大陆西部罗马帝国在大体同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游牧世界各部入侵的形势，比东部和中部先后所临遇的还要困难。汉和魏晋之际的中国也好，笈多时期的印度也好，萨珊波斯也好，入侵的北方部族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少量是由匈奴和操印欧语的吐火罗人混血的白匈奴。罗马帝国所面临的，除了精于骑兵战术、强悍善战的匈奴人外，还有东西哥特和其他各支日耳曼人，斯拉夫人，还有从中国北部被突厥人赶到西方去的柔然，西方史书称为阿瓦尔人。可以说，在横亘亚欧大陆创建各古典文明的长弧形地带，当游牧世界各族，包括一些已在趋向农耕的部族，向农耕世界作历史上第二次大冲击的时期，西半壁受到的压力最为沉重。以后的历史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在由阿姆河一带席卷而西的匈奴人的进逼之下，东西哥特人最先突入罗马帝国的边境。阿德里亚堡之战（378年），哥特人歼灭了罗马的主力兵团。东罗马皇帝瓦伦斯战死，说明罗马已经无力阻挡北方各部族的南下。此后，匈奴人，尤其是日耳曼的其他各族，一批又一批波涛相逐，涌入罗马帝国的西部，劫掠、征服之后，建立了日耳曼人各族的统治，使欧洲的政治地图也大为变样。东部罗马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的冲击下，龟缩到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有点象中国的东晋、印度的笈多，保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这就是拜占廷帝国。

公元七世纪，还有从亚洲西南角冲入农耕世界的属于闪族的游牧部族，这就是也精于骑兵战的阿拉伯人。骑兵在什么时候引入阿拉伯，现在还不清楚，但最早恐怕要在公元一世纪或稍后。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皇帝薛西斯向受他辖制的各部落征集兵力，阿拉伯带去了骑兵。不过这些骑兵骑的不是马，据希罗多德所记，是和“马一样快的骆驼”。自从马引进了阿拉伯的草原地区，阿拉伯就组成一种特别的马和骆驼相配合的骑兵。马用以奔驰作战，驼用以载运辎重。在行军缺水的时候，就宰杀骆驼，从驼囊中取水饮马。阿拉伯人在出击后的一个多世纪，占有了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农耕世界将近一半的地区，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二次大冲击随之结束。

第二次冲击后约四、五个世纪，到了十三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投入冲击成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人，原来是驾御战车或驰马弯弓的部落，这时大都已接受了农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时间有好几个世纪以至一两千年之久了，他们不但不再是冲击力量的主体，而且变成了受冲击的客体，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发动这次冲击的蒙古人，各部族估计在内，总人口大概不出一百万人，其兵源最大限额不出十二、三万人。如果

没有众多的突厥部落与它联合，没有机动性极高的骑兵，就很难设想它能将兵力作如此大范围、大幅度的有效分布。蒙古骑兵战马日驰约一百四、五十公里，大弓射程可达一百八十公尺，作战时善于分兵突袭，围歼人数远远超过己方的敌军。其攻击力的旺盛，使分散的俄罗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发，都对之难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稳固的蒙古帝国形成之后，到十三世纪后期，第三次冲击高潮渐渐平息。十四世纪，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领帖木儿对中亚、西亚、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这次大冲击的余波，帖木儿帝国在他本人死后也就随即瓦解了。

对游牧世界各部族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冲击浪潮作了历史回顾之后，可以看出，三次冲击的部族构成有明显的变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有匈奴、鲜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尔瓦人、西部印欧种人的日耳曼各支、斯拉夫各支、闪族的阿拉伯人等；第三次则大大减少，主要只是蒙古人和与之联合的突厥人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初步解释是：每一次冲击浪潮的结果，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部族、倾向于农耕或开始从事农耕的半游牧部族，很多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之中。从而，在卷入部族最多的第二次冲击高潮之后，第三次冲击的范围虽然很广，但卷入的部族却很少了；而在第三次冲击之后，更多的来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融入了农耕世界，虽然这里、那里还有游牧部族的存在，但已再也发动不了向南冲击的浪潮了。农耕世界虽然在受到冲击时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终于显示出优越性，显示出吸收、融化打进来的游牧、半游牧、趋向于农耕的各部族的能力。公元前后三千年南农北牧矛盾的这一历史运动的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大冲击结束的时候，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十四、十五世纪之交。亚欧大陆上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历史矛盾运动至此终止，世界历史的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现在，我们应当讨论一下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对于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过程起了什么作用，而这些作用又有怎样的历史限度。

四、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

我这样觉得，有一种民族的、种族的、植根于农耕世界文明的偏见，往往使得对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几次冲击的历史意义的考察受到不应有的局限。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农耕世界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文明，文字的发明就是农耕世界的骄傲之一。有了文字，就有了历史记载。农耕世界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打上了农耕世界思想观念的烙印。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农耕世界文明的产儿。因此，很少例外，农耕世界的历史学几乎都对游牧世界带有歧视，都把以战车和骑兵武装起来的、使农耕世界屡次吃了亏的游牧部族、半游牧部族，看作是历史上的破坏力量。这种歧视的影响一直传到近代，有些西方人给他们所厌恨并怀有敌意的人加上“匈奴”的谥号。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1750—1819)反对法国革命，就把革命的法国人称为“西方的匈奴”。这种歧视、偏见不破除，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中的意义。

我们之所以要讲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问题，是因为、而且完全完全是因为，自人类由

食物采集者发展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这两个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发生各种矛盾，由于各自内部阶级分化而趋于激化的矛盾，而对于由此矛盾产生的游牧世界诸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几次大冲击，必须从超越地区和国别的广度，来考察它们在历史之所以成为世界史这个漫长过程中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的限度。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有积极意义的影响。首先是两者之间扩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对方学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术。喜克索斯人驾着双轮战车冲进了埃及，统治埃及一百多年，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却从征服者手中得到了制造和使用战车的技术。十八王朝的末帝吐坦哈门驾着十分华美的战车的场景，保留在一九二二年所发现的他的墓中殉葬物的装饰画面上。中国的赵武灵王曾经从北方胡人那里学到了骑射之术，强化了他的国家的守备。而入侵农耕世界的游牧部族从农耕世界接受了更多的东西，即便是打了就跑、破坏之后就引兵他去的，也学到了东西，并且往往是重要的东西。斯基泰人从农耕世界学会金属冶炼，不但自己学会了，而且传播给草原上的其它游牧部族。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是历史上游牧部族对入侵地区破坏最烈的一次。即使如此，蒙古人和突厥人在大肆破坏之后，还把有技巧的工匠带走。成吉思汗远征花剌子模时对攻陷的城市是这样做的，帖木儿对所征服的中亚、西亚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带走工匠的目的，是为了供应生活和战争的需要，但是，发展着的历史却通过这一点，当事者的他们所无从意识到的这一点，向游牧世界散布农耕世界经济文化的影响，为多少打开各个民族的闭塞，向程度越来越大的世界史发展尽到了他们自己意识不到的力量。

在大举冲击之后在农耕世界定居下来的游牧、半游牧民族，其发展的前景就更值得重视了。他们是以征服者的地位定居下来的，其上层统治者成为被征服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其一般士卒成为有某些特权的阶层。开头，他们都鄙视农耕，认为游牧高于农耕，挽弓优于扶犁。阿拉伯的贝杜因人认为只有游牧、狩猎、劫掠才是大丈夫的事业，农耕无异损害他们的尊严。根据《元史·耶律楚材传》所载，蒙古进入长城以南之后，就有这样的统治人物，主张把汉人赶走，把耕地全改为牧场，如别迭等。但是，相对于游牧而言，农耕这一先进经济的吸引力是抗拒不了的。进入农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到头来很少例外，大都走上农耕化的道路，从以游牧为本的经济走向以农耕为本的经济。一旦走向农耕化的道路，他们就按照他们进入农耕世界时社会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逐步采取和适应了定居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制度、道德规范、思想、学术、文艺等等。他们还会利用被征服地区原有的统治阶级，沿袭原有的制度，把农民的生产作为他们的租税俸禄之源，从而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农本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有的建立了大帝国，强大的王朝，越是能够适应农耕世界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就越能维持他们的统治，这和农耕世界在不同社会阶段上自身崛起的强大国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前面所考察的发动和卷入三大冲击浪潮的来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包括半游牧、趋向农耕的部族，如赫梯人、胡里安人、米丹尼人、迦喜特人、喜克索斯人、匈奴人、塞人、突厥人、鲜卑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基本上都逐渐溶入农耕世界，一批又一批地成为农耕世界历史发展中的新因素，使农耕世界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显示它在经济文化上相对于游牧世界的优势。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国，在客观上促进了亚欧大陆东西之间的陆上交通。阿拉伯人的帝国除发展了亚欧两大洲之间的陆上交通而外，还发展了连接红海、印度洋、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大食商人在我国